

中國佛教文化史

第一冊

孫昌武 著

中華書局

中国佛教文化史

第一册

孙昌武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文化史/孙昌武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0.4
ISBN 978-7-101-06701-9

I. 中… II. 孙… III. 佛教史-中国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866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佛教文化史(全五册) |
| 著 者 | 孙昌武 |
| 责任编辑 | 罗华彤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9 插页 20 字数 1800 千字 |
| 印 数 | 1—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6701-9 |
| 定 价 | 380.00 元 |
-

目 录

导 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贡献	1
第一编	67
第一章 两大文化传统交汇——佛教输入中土的环境和土壤	71
第二章 佛教初传——创建新的社会组织	111
第三章 佛教初传——输入新的宗教信仰	135
第四章 佛教初传——输入外来文化	167
第五章 中国佛教早期僧侣与僧团	209
第六章 早期佛典传译——“古译”时代	229
第七章 西行求法运动	255
第八章 《般若》与玄学合流——格义与六家	277
第九章 东晋名士与名僧	313
第十章 早期佛、道二教关系：相依附与相冲突	347
第十一章 道安——“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	379
第十二章 慧远——中国佛教文化的开拓者	399
第二编	433
第一章 鸠摩罗什与“旧译”的成就	437

第二章 佛典翻译文学的成就	483
第三章 中土疑伪经撰著及其意义	531
第四章 僧团发展与寺院建设	571
第五章 士族的佛教信仰与佛教文化	623
第六章 法集结社及其衍变	665
第七章 佛教节祭斋仪及其演变	695
第八章 南北王朝的排佛与毁佛	735
第九章 佛教给予道教发展的影响	771
第十章 佛教信仰潮流勃兴	793
第十一章 义学与禅学的发展——创建中国佛学	905
第十二章 义学学风及其影响	945
第十三章 明佛护法论争	973
第十四章 寺院——文化中心与救济机构	1111
第十五章 佛教戒律与伦理	1153
第十六章 寺院教育与外学	1197
第十七章 寺院藏书与佛教目录学	1231
第十八章 佛教史学的繁荣	1257
第十九章 佛教对中国语言和语言学的贡献	1301
第二十章 僧人的诗文创作成就	1335
第二十一章 两晋南北朝文人与佛教	1373
第二十二章 佛教义学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	1411
第二十三章 敦煌——中国古代佛教文化宝库	1439
第二十四章 佛教石窟艺术	1481
第二十五章 隋唐以前寺塔建筑艺术	1507
第二十六章 隋唐以前佛教造像艺术	1533
第二十七章 隋唐以前佛教绘画艺术	1563

第二十八章 佛教乐舞艺术及其影响	1583
第二十九章 佛教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	1613
第三十章 作为民族融和与文化整合纽带的中国佛教	1643

第三编

第一章 中国佛教的成熟与兴盛——宗派佛教	1683
第二章 玄奘与佛典“新译”的成就	1721
第三章 智顗、灌顶和天台宗	1759
第四章 法藏、宗密和华严宗	1771
第五章 禅宗与神秀、慧能、神会等祖师	1795
第六章 净土信仰和净土宗	1855
第七章 诗僧及其创作	1893
第八章 唐、宋时期的禅文学	1955
第九章 隋唐五代文人与佛教	2023
第十章 唐代及其以后的佛教通俗文学	2095
第十一章 唐五代的排佛和毁佛	2159
第十二章 宗派佛教的衰落和衍变	2199
第十三章 大藏经的编辑与刊刻	2243
第十四章 智圆和契嵩——援儒入释	2259
第十五章 宋代佛教与理学	2299
第十六章 宋代及其以后的佛教与文人	2379
第十七章 古典小说、戏曲与佛教	2469
第十八章 禅宗“心性”说与文学思想	2523
第十九章 隋唐及其以后塔寺艺术	2555
第二十章 隋唐及其以后佛教造像艺术	2583

第二十一章 唐代及其以后佛教绘画艺术	2607
第二十二章 “心学”及明末“狂禅”思潮	2663
第二十三章 近代文人与佛教	2695
 结 语	 2723
 附 录	 2737
主要参考和引用书目	2739
人名索引	2781
书名索引	2823
 代后记：感恩与致谢	 2855

导 论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贡献

一

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包括佛教文化史，陈寅恪的两段话是具有深刻指导意义的。一段论及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规律说：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①

佛教输入中国并得以扎根、发展，乃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其得以成功，取得成就，正是在本民族思想文化土壤上积极地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并重新加以创造的结果。另一段论及研究古人学说应当采取的态度：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①

经过上一世纪有关宗教学术研究领域波谲云诡的激烈震荡，今天来讨论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包括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和佛教文化史，怀抱这样的态度更显得特别必要。

英国宗教人类学家菲奥纳·鲍伊曾指出：

我们行动的方式既影响社会，也影响我们周围的生命之网。而我们的行为，则是由我们所思考的东西、我们的价值和信仰体系决定的。^②

人类的全部行为与活动，是依据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当下认识进行的，这种状态和认识受到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而在人的认识中，信仰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当信仰心提升、演化为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又凝聚起信众，结成群体，这群体再形成宗教团体的时候，就成为巨大的社会力量。而宗教一经形成，又给更多的人提供信仰，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在这一往复递进的过程中，宗教得以弘传、发展，也在教化、改造着人们自身。这样，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波澜壮阔，演出无数恢宏壮伟、让人眼花缭乱的场面，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起着极其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又具有神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

② 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Fiona Bowie: *The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2000)第136页，金泽、何其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秘的、先验的、盲目的特征，又会带来消极的作用和影响。历史上的宗教活动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血腥的战争与仇杀，引起国家、民族间，各宗教和宗教教派间的对抗、斗争，绵延岁月，不得消解，对于人类进步、世界和平、民族团结又造成破坏，形成阻碍。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世界全部宗教史上，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接受佛教乃是一个卓越的特例。荷兰中国学家许里和关于中国佛教早期发展历史的名著题名为《佛教征服中国》。但是从实际情况看，与其使用“征服”一语，不如用“融入”一词更为合宜^①。自从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伊始^②，中国人就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气魄，接纳了这一新的宗教。当然起初接触到这一外来宗教的只是少数人，这一外来宗教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不是没有遇到不解、怀疑、抵制以至对抗，但是从总体趋势说，却是相当平稳地、顺畅地被接受，逐步地传播、扩展开来，扎根、壮大起来。继少数先行者之后，社会各阶层有更多的人接纳了这一外来宗教。这里所谓“接纳”，既包括信仰，也包括更多的人从各自角度加以“认可”或“包容”。这样，经过数百年传播，这一外来佛教终于发展、演变成为具有鲜明本土民族性格的宗教，并与本土道教一起，成为在中国民众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主要宗教。而且，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之下，虽然真正的佛教信徒在民众中始终居于少数，但却有更多的人对佛教抱有亲切的同情心或认同感。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更有许多人能够或善于对于佛教教理和与之相关的学术、文化不同程度地理解和接受，使之成为发展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这样，佛教在中国虽然一直没有取得政治的或思想的统治或主导地位，但它却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它作为

① 关于佛教“征服”中国的观念，并不是许里和个人的看法。胡适曾说过“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胡适口述自传》）。西方学者如汤因比更直接把中国文明包含在“印度大乘文明”的范畴之中。

② 一般说佛教产生于印度，或称“印度佛教”，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佛陀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而从历史发展看，从佛陀时代的“原始佛教”到众多部派形成，经历几世纪的漫长时期，地域更包括今南亚和中亚众多国度。

古代中国成功地接受和消化外来文化的成果，在历史发展中已经逐步融入到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成为构筑中国文化支柱的三大知识和思想体系——儒学、道家 and 道教、佛教——之一、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指出：

今天的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包括继承普兰克(Max Planck)、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海森堡(Warnen Heisenberg)传统的自然科学家，他们都在强调分析和综合互补，理性知识和直觉智慧互补，科研和伦理互补，也就是科学和宗教互补。^①

人类在进化和发展中不断暴露出各种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和冲突，宗教归根结底是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被创造出来的。佛教这一伟大的世界宗教，也是人类为解决自身矛盾和冲突的伟大建树。当前人类正持续地被各种难题所困扰：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失衡，国家间、民族间以至宗教间相互对抗，社会伦理观和价值观普遍地偏失与空洞化，财富积累和集中造成严重社会不公，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着焦灼不安和欲求不满，如此等等，这些都为宗教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需要与空间。这样，宗教信仰、宗教观念、宗教情怀等等，就为现代人提供了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的精神内容。一方面是当今世界面临的许多尖锐、重大而迫切的课题需要解决，在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另一方面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素质亟需提升。宗教为解决这些课题提供出大量有价值的内容和广泛的正、反面教训。历史的经验乃是今人的借鉴。实际上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包括国家、民族的与家庭、个人的，许多都是古代宗教曾经面临和试图解决的问题。因而研究和了解中国佛教史，特别是佛教文化史，无论对于民族整体或是对于个人，又都不是单纯的理论课题，而是具有现实

① 秦家懿、孔汉思(Hans Küng)《中国宗教与基督教》(*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 Doubleday NY, 1989)第233页，吴华译，三联书店，1997年。

迫切性的。

本书题名为《中国佛教文化史》。这是个内容极其广泛、复杂的题目。首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佛教文化？历来就是相当含混、但又必须明确的概念。有的西方学者搜集不同的文化定义，达 164 种之多^①。对文化含义的理解不同，对本书作为课题的“佛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史”内涵的理解必然会不一致。大体上从广义说，文化乃是人类智慧在长远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这样的概念出发，一切宗教包括佛教本身就是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从而佛教文化史就可以等同于佛教史。从狭义说，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结构，依据内容又可以划分为众多领域，如政治文化、伦理文化等等。从这样的角度看，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则是文化的一个具体领域，它在发展中与文化其他领域有着复杂的联系。从后一种观念出发，佛教文化史则应探讨佛教在长期发展中与诸多文化领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得到发展、取得成果的历史。本书基本是采取后一种观念来理解、处理佛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史这两个概念的。

史学家李济曾精辟地指出：“今日或过去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由于文化接触的结果。”^②同样，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接触乃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从根本上说，佛教输入中国正成为这样一种动力。又佛教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如今已成为世界性宗教。作为世界性宗教，它在所传播的民族和国度中具有共同的内容、形态和发展规律；但适应所传播民族和国度的具体条件和需要，又形成各自的特点。特别是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论，外来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极其丰厚的国度。这就决定了外来佛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本土固有传统，而只能适应、融入这一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它以其独特内容丰富、补充中华民族的固有传统内涵，另一方面又相应地

① 参阅许国璋《文明和文化》，王元化名誉主编《释中国》第 1 卷第 617—641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

② 《中国文明的开始》第 18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改变、铸造着自身。这样，传入中国的佛教既是世界性宗教佛教的重要构成部分，又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独创内容的汉传佛教一系。这一系统的佛教在历史上已远传周边各国、各民族之中，近代更扩展到世界各国。因此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史，应当特别注重探讨外来佛教在中国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创新与演变，注重研究作为外来文化载体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诸领域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注重中国佛教在文化诸领域的独特而重大的创获。这样，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包含古代中、外（南亚和中亚）佛教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的历史，又是古代中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外来文化在中土具体环境下被积极接纳、持续发展与全面创新、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累十分丰厚。另一方面，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佛教是印度对中国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对接受国的宗教、哲学与艺术有着如此令人震惊并能导致大发展的效果，以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①这两种因素聚合起来，使得中国佛教文化无限地博大精深，内涵极其丰富多彩，涉及领域极其众多，其历史发展过程更是跌宕起伏、复杂多变。本来相关研究受到种种局限，宗教现象更多有神秘难解之处。加之在中国，有关宗教的研究传统上历来更多受到陈寅恪所指出的“意执之偏蔽”和“知见之狭隘”^②的限制，这一极其复杂繁难的研究领域又是多年来学界较少关注、评价更往往是多有偏颇的。这些都给本课题研究造成相当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却正是对于研究者提出的严酷挑战和严格要求，也更能够激发起研究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赐予研究者特殊的幸运。笔者自知才疏学浅，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依据个人能力和水平，勉力在这一课题上作出尝试。

本书所述基本限于有关汉传佛教的情况。实际上中国佛教文化还应包括

① J. 勒卢瓦·戴维森《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Edited by A. L. Bash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1984）第669页，闵光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0页。

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内容。这两个部分与汉传佛教同样复杂而丰富，更与汉传佛教有密切的关联。缺少这两部分，就不是完整的中国佛教文化史。本书对于这一领域虽然略有涉及，但没有作专门课题来论说。这一方面是按目前学术界约定俗成办法，关于历史上藏传和南传佛教的研究分属专门的研究领域，习惯上把汉传佛教史称为中国佛教史。而且它也确实是中国佛教的主体。另一方面，如果把藏传和南传文化（实际上这也是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纳入到一部书之中，不仅难于操作，而且笔者的知识和能力也不允许。从这样的角度看，这里应当郑重说明，这是一部不完整的、主要是汉传佛教的文化史。

二

两千一百多年前的公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国势鼎盛，声威远播四海。张骞“凿空”，甘英西使，开通“丝绸之路”，建设起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当时正是南亚、中亚地区佛教兴盛的时候，在东来西往的商队里，有一批批佛教僧侣和信徒。他们怀抱着无限神往，前来东方这个繁荣昌盛的大帝国。当他们乘危履险，过雪山，越大漠，风尘仆仆，摩肩继踵，前赴后继，九死一生，在漫漫长途上奔波的时候，绝不会想到，正是这如涓涓细流一样少数人的活动，逐渐扩展为输入外来宗教与文化的洪涛，给本来已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赋予了强大活力。在此后两千余年间，中华大地改朝换代，动荡不已，这外来佛教却在被接受、消化、容摄、创新的过程中，生生不息，持续地开创出新生面，结出丰硕的文化果实。

佛教能够在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与其产生本土大不相同的环境中顺利地弘传、发展，逐渐蔚为大国，竟成为流行中国的主要宗教，有多方面主、客观条件在发挥作用。这些条件重要的是：

首先，就印度佛教本身说，它具有浓厚的文化性格。它作为具有悠久发

展历史和丰厚文化积累的印度文化的载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它在世界诸宗教中突出的特点和优点，也是它的发展历时久远而昌盛，赢得各国、各民族众多信众的内在条件。

佛教形成和流行的印度次大陆和西域乃是古代世界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曾指出：

佛降生时，正是印度有着一个惊人的精神激动和哲学探索的时代。

他又说：

佛虽是一个反抗者，可是并不曾使他和本土的古代信仰隔绝。黎斯·戴维兹夫人说道：“……他的道德伦理有很多可以和早期或晚期的印度教书籍中的东西相比美。乔达摩的创作力是在于他把旁人已经说过的东西加以修正、扩充、发扬光大，并加以系统化；是在于把一些印度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所公认的公道和正义的原则，贯彻到他们的论理的结论上面去。他和其他大师的分别主要在于他那恳挚的热情和他那广阔的大慈大悲的精神。”^①

释迦牟尼所创建的佛教继承和发展了当时印度次大陆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包括婆罗门教的文化成果。佛教实际是总结这一广大地区文化发展成就的产物。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作为“觉者”，不仅是伟大的宗教家，更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的思想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他所创立的佛教不仅确立起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体系，更重视对于这种信仰的论证，因而说“佛陀的教

① 《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 Meridian Books Limited, London, 1951)第207-209页，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

义……本质上是理智的”^①。佛陀在世的时候，组织信众，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僧团。他的团体与孔子或苏格拉底教导的团体颇为相似，具有明显的教学组织的性格。佛陀当初曾明确反对作为一般宗教重要内容的灵异、诅咒等，更否认婆罗门教祭祀万能信仰。这种富于理性、注重教理的特征作为传统后来一直被保持下来。早期佛典、较真实保存佛陀言教的《阿含经》包含有深刻的哲理内涵和丰富的伦理内容，表达这些内容又多采取比喻、象征、夸张等文学形式。这样从一定意义说，这些典籍就明显具有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的性质。而由原始佛教发展为部派佛教，再发展为大乘佛教，其全部教理建筑在庞大的、愈益严密和系统的宗教思想理论体系之上，其学术内容也愈加丰富。著名的大乘佛教论师如龙树、提婆、无著、世亲、法称、寂天等，与佛陀一样，都是卓越的宗教家，又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而作为佛教活动核心的僧团不只是信仰者修道的团体，更从事多方面的文化活动。作为其修习对象的，除了关于教法的“内明”之外，还有因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等世俗学问，统称为“五明”。这些在现代科学体系里是属于逻辑学、语言文字之学、工程技术和医药学等领域的内容。这样的僧团同时又作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存在，体现出鲜明的文化性格。而且随着佛教的发展，其所包容的思想、文化内容也在不断扩展。直到印度佛教在公元十二世纪消亡不断结集出来的大量佛教经典不只是宗教圣书，更是古印度与传播所及诸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宝典，是极其庞大的知识堆积。所以有的学者说，佛教经典里的学问是无所不包的。特别是在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之学等领域，佛教取得的成果更具有鲜明特色和极高水准。这些都构成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成为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这样，佛教不仅改变了传播地区民众的精神面貌，更大幅度地改变了这些地区文化发展的面貌。

① 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Sir 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An Historical Sketch*,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1954)第1卷第284页，李荣照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对于中国来说，佛教逐步广泛、深入地传播，陆续翻译大量佛典，随之输入了内容丰富、价值重大的外来文化和学术。其中许多内容是中土传统所缺乏、在文化发展中值得借鉴和汲取的。佛教这种思想、文化上的优势，是它能够被具有高度文化、又富有理性传统的古代中国人所接受的重要条件。

其次，佛教和随之传入中土的佛教文化又具有开放的、包容的性格。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曾精辟地指出过：

潜在于佛教的印度式的心理素质具有绝对的包容性。^①

这一特点的形成，正与它的浓厚的文化性格有直接关系。注重文化，富于文化内容，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蒙昧的迷信和凝固的教条所造成的偏见。后者正是一般宗教的根本特征之一。佛教当然也具有这种特征，但相对而言是较为淡薄的。

佛教的开放性格又和作为它基本教理内容的终极追求有关系。根据佛传，示现在世的佛陀不是“先知”，他是勤奋的学徒，是不倦地探索、追求真理的人。在成道前，他曾经过长期、艰苦的求道过程，包括向各类“外道”学习。他所创立的佛教吸收了古印度文化积累的丰富内容，包括他所反对的婆罗门教的内容。佛陀本人是一位觉悟宇宙真实的“觉者”。他不相信、不鼓吹“天启”，而主张“悟道”主要基于人自身固有的本性与能力。佛陀肯定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追求和实现智能、道德和知识的努力，对于人的得救抱持肯定、乐观的态度，因而积极地鼓励门徒自己去探求，去发现自身宝藏。发展到大乘佛教阶段，这种弘通、开放的性格更得到发扬，明确提出所谓菩萨“四依”之说，即肯定佛陀的教法是依法不依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的。这就容许人们在已有的经教之外，更自由、更开放地发挥佛

① 《禅思想史の研究》，《铃木大拙全集》第2卷第381页，岩波书店，1980年。